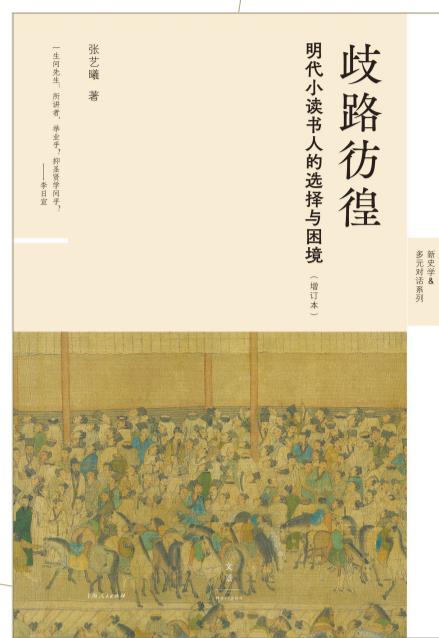


重磅品荐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张艺曦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明代大儒很多,他们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遮蔽了历史暗处的那些身影,那些徘徊于科举、生计、良知与理想之间的小读书人,他们将心学精义渗入市井,一边苦读,一边在悟道与迷惘间挣扎。大概所有时代都有小人物的悲歌,翻开《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我忽然就有了深深的共情。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南昌西山,一位年逾六旬的老者在草庐前负手而立。他叫李鼎,曾是顺天府举人,写过《边策》《海策》等,此刻在等待一个预言。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浓缩了明代小读书人的精神困境:在经世理想、学术追求与生存焦虑之间,他们如同风中的烛火,明明灭灭。张艺曦在《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中聚焦的小读书人,就是这群名字并不响亮的地方人士。他们多出身地方士族,拥有中低级功名或布衣身份,在阳明心学、文学复古、科举制艺三重风潮中辗转徘徊。

江西新城的寒门士子涂伯昌,因朱熹的文章困惑不已,辗转吉安问学两年却未能解惑,惭愧无比,以致在归途中放声大哭。涂伯昌后来转向制艺,成为地方文坛领袖。这个未被《明儒学案》记载的场景,被张艺曦从族谱的缝隙中发现。当王畿在书院宣讲“致良知”时,李鼎在乡里组织族会进行“二次传讲”;当复古派文人推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时,涂伯昌们将古文技巧融入制艺写作。这种“介于精英与平民之间”的身份,使他们成为大儒思想世俗化的关键中介,小读书人并非被动地跟随风潮,而是以“游走于大儒之间”的方式,成为思想传播的地方枢纽。

作者试图用一本书的力量打捞这些“烛火”。当传统思想家聚焦于王阳明、李贽等大儒时,这本书将镜头对准了他们——州县学宫的生员、诗文社集的边缘参与者、在讲会中记录

笔记的门徒、科举路上的失败者或幸运儿。尽管他们既非思想史上的大儒,亦非政治舞台的主角,却在地方丈量田土、组织社集、传播思想等实务中,成为历史洪流的“毛细血管”。作者从方志、族谱、笔记中拼凑出他们碎片化的人生轨迹。

从日诵万言到知识囤积

明中期的思想界存在一场激烈的拉锯战。阳明心学高举“满街都是圣人”的哲学论点,文学复古派呐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科举制艺则以八股文为利刃,切割着所有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小读书人如同站在十字路口的行者,每一步都充满悖论。

隋唐以前的相关记载,多将“一目十行”“日诵万言”视为少数士人的特殊才能,但两宋以后,随着署名欧阳修的读书法的流行而有变,这个读书法提出对一个中人可行的方式,不追求超凡的记忆力,而是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借由每日的积累,得到跟记忆力超凡者同样的结果。由于欧阳修读书法的流行,即使一般士人也必须承受记诵数十万言儒经的期待与压力。尤其随着明中期以后印刷术的流行,许多过去不易得不易见的儒经与古籍都变得相对易得易见,加上科举制度下,八股文写作亦要求记诵儒经及博览子史,这些都对士人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当“一目十行”“日诵万言”从天赋异禀变成科举制度的刚性指标,中国近世士人的大脑,早已成为被数据量化的存储器。

北齐河南王高孝瑜“十行俱下”的典故是个案,却在雕版印刷流行后成为普遍标准。两宋以降,随着书籍流通量激增,欧阳修读书法将记诵任务拆解为“日诵三百字”的“温和暴政”,看似降低门槛,实则将士人拖入“日积月累”的马拉松。明中期以后,科举对“博闻强记”的要

明朝小人物的微观生命史

王小柔

求达到顶峰,《资治通鉴》三百余万字的体量,竟被士人夸饰为“一月尽之”的壮举,尽管实际仅是“略能遍记之”的熟读。这种对记忆力的病态推崇,在清代考据学风中演变为“一目数十行”的数字狂欢。当士人将《汉书》卷帙按“日易一帧”的速度消化,当《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过目不忘”为考核标准,知识的获取早已脱离理解的本质,沦为数据囤积的竞赛。

科举囚笼中认知异化

在明代,科举不仅是晋升通道,更是身份认同的核心。小读书人的生命轨迹,往往被科举制度切割为不同的关卡,每一道关卡都是一场生存战争。李鼎考中顺天府举人后,自以为踏上坦途,却在会试中屡屡受挫,最终“落魄江左”,不得不以制艺授徒为生。

在科举制度的规训下,记忆力焦虑成为士人无法挣脱的枷锁。李鼎晚年注解典籍时,仍需兼顾制艺授徒,这种“宗教研究与应试教育”的双重负担,恰是制度性焦虑的典型写照。雕版印刷的普及本应解放思想,却意外加剧了认知异化。当《传习录》等小册子成为“便携版”思想武器,士人对经典的理解被简化为“关键词检索”,涂伯昌早年为格物问题“放声大哭”,中年却能将心学概念转化为八股文技巧,这种转变不是思想成熟,而是生存策略的无奈调整。小读书人始终试图调和“穷经”与“应举”,将心学转化为科举策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记忆力表演”的流行。萧颖士与友人“诵路旁碑”的竞赛,在明代演变为归有光与季龙伯的寿序记忆对决。暗示了记忆力与创造力的内在冲突,前者是制度认可的“硬通货”,后者则是被边缘化的“危险因子”。

在普遍的焦虑中,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朱熹主张“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强调“书须成诵”的目的是“穷理”,而非应付考试。他对“资质鲁钝”者这样宽慰:“福州陈晋之极鲁钝,读书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实则是对量化考核的温和抵抗。王守仁则走得更远。他在《训蒙大意》中提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主张根据资质调整学习量,避免“精神力量有余,而无厌倦之患”。这种“少而精”的理念,与现代教育中的“深度学习”不谋而合。更具颠覆性的是,他将“良知”凌驾于记诵之上,认为“强记之心”“欲速之心”皆需克去,直指记忆力焦虑的根源——对功名的执念,但这些思想突困在

科举压力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四百多年后,现代人陷入新的认知困境: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化记忆”编织着新的网。明代士人的“记忆力比赛”在现代演变为“最强大脑”综艺,而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术则转变为“思维导图”等。本质上,这些都是应对信息爆炸的生存策略。那些坚持“慢读”的小众社群,那些拒绝“学术快餐”的研究者,在记忆力焦虑的狂潮中,依然守护着知识的本真价值。

在耕读与游幕间挣扎

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甲申国变,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让所有士人被迫重新校准人生坐标。涂伯昌在明亡后痛批心学,本质上是一个底层知识人对时代剧变的应激反应。小读书人在遭遇生活的困顿后,只能退回到制艺授徒的日常,在制度框架内继续扮演“边缘人”角色。

小读书人从“谈心论性”转向“八股文写作”,不是因为思想的堕落,而是科举制度下的必然选择。当他们发现“致良知”难以解决钱粮兵甲的具体问题时,文学复古的审美理想便显得虚妄;他们在科举场域中摸爬滚打,又不得不将心学转化为八股文的写作策略。明王朝崩塌,那些曾被视为“解放思想”的心学话语,突然变成了“亡国之学”的替罪羊。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调侃,在明代小读书人身上有深刻体现。他们既非权贵阶层,又不屑于从事农商,“耕读传家”往往是理想,现实则是“穷愁著书”的窘境。李鼎的姻亲张位曾是大学士,却无法改变他“落魄江左”的命运。这种无力感贯穿于小读书人的生存常态:他们依赖家族支持参加科举,一旦落第,便只能以游幕、讲学、编书为生。涂伯昌“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师从浙江黄汝亨研习制艺”,这种选择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而是赤裸裸的生存需求。在金溪县,许多小读书人连文集都没有留下,必须利用族谱资料才能够重构他们的生活。作者特别提到“制艺风潮”对士人生活的塑造:“万历年间的制艺风潮兴起后,阳明心学的书籍更普遍地被人从制艺写作的角度阅读。”当文学复古运动与心学讲会衰落后,制艺文社如豫章社、复社成为主流。

传统思想史往往聚焦大儒的“登坛讲道”,却忽略“小读书人”的二次传讲价值。在吉安、金溪县等地,阳明学讲会的真正活力源于地方士人;他们将王畿、罗汝芳的抽象理论转化为通俗话语,在乡会、族会中进行传播。李鼎在南昌组织的讲会,参与者多为“郡县生员、布衣处士”,这种“自下而

上”的传播模式,让心学突破精英圈层,成为“从基层而起的运动”。《传习录》等小册子的民间传抄,更凸显小读书人的传播力量。当大儒讲学受限于时空,这些“便携版”思想载体却在市井坊间广泛流通。涂伯昌早年在吉安问学未果,正是通过阅读《大学》古本自行领悟——这种“无师自通”的路径,揭示了思想传播的多元性:即便没有权威背书,底层士人仍能通过文本互动,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

小读书人并非只埋首故纸堆,更以“地方精英”身份介入现实事务。有小读书人在参与西北边防实务时,将心学“万物一体”理想转化为治理方案;金溪县士人在明末心学退潮后,将社集从“谈心论性”转向“制艺写作”,主动重构地方文教生态。这种跨界实践,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灵活调适能力。小读书人的“游走于大儒之间”特性,使其成为思想与社会的中介。当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时,真正将其落实到田土丈量、赋役改革中的,正是李鼎这样的地方士人。他们的实践,让抽象哲学概念落地生根,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隐形力量。

在正史的宏大叙事中,小读书人的名字往往被过滤,但在地方志、族谱、私人笔记中,他们留下了吉光片羽。李鼎的《边策》《海策》未被《明史》收录,却在地方文献中成为研究晚明边防的重要史料;涂伯昌的《涂子一杯水》文集未入《四库全书》,却因其对心学的反思,成为思想史转型的见证。这种“边缘性保存”,恰似现代学术体系中被视为“非核心成果”的田野笔记——它们在主流评价体系外默默生长,终将在某个历史时刻显现独特价值。

四百多年前的李鼎不会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后世一位学者从故纸堆中拾起,成为解读晚明文化转型的一把钥匙。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明儒学案》,那些熟悉的大家名字突然变得陌生,因为在他们的光环背后,曾有多少李鼎、涂伯昌的身影在黑暗中摸索?本书的书写,如同手持火炬进入历史的深巷,照亮了被遗忘的角落。在这里,没有英雄史诗,只有凡人的呼吸;没有高头讲章,只有思想的阵痛;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细节的力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思想与生计之间,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明代小读书人始终在寻找平衡的支点。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本质是一曲献给所有时代“边缘知识人”的安魂曲,那些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生命轨迹,恰恰是文明最真实的心跳。当我们学会在明代小读书人的微光中看见永恒,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无数平凡灵魂共同谱写的长歌。

点燃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

李峰嵘



《我的村小学校》,高巧林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3月。

技术手法来描绘学到知识是多么美好,每次学到一个字都让他获得极大的乐趣。因为知识得来不易,他无比珍惜。小小少年通过读书点燃内心最深的渴望,成为更强大的自己,更美好的自己,也用内心的光明去照亮世界!

我们都说现在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到底学习是为了什么。这本书告诉我们:是为了写一个“人”字!怎样写好这个“人”字呢?从一撇一捺、一点一滴做起。包括讲卫生懂礼貌、上课认真听讲不开小差、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遵纪守法、品德端正、团结友爱……保有自由浪漫、天真活泼的天性的同时,去掉那些粗野散漫、不拘管束的不良习气,培养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顽强品格,练就过硬的本领,培养高超的智慧,才能够写就大大的端正的“人”。

这个端正的“人”,来自于周围人的滋养,来自于多才多艺、温柔可亲的老师的谆谆教诲,来自于小主人公爸爸妈妈的不畏困难、默默支持。书里的老师没有因为孩子贫穷而冷落他,父母没有因为忙碌而忽视了孩子,他们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功课、没有经济能力提供最好的学习工具,但是他们默默地陪着孩子坐在油灯下写作业,会用铁凿削铅笔,把木板刻成垫板……这些无言的爱让巧林备受鼓舞,也会关心他人。

为什么在巧林心中有这样强烈的求知欲?因为渴望。巧林原本是一个失学的孩子,没有人给他布置作业,但是他知道能读书识字是好事!正如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书中用了无数精巧的艺术手法来描绘学到知识是多么美好,每次学到一个字都让他获得极大的乐趣。因为知识得来不易,他无比珍惜。小小少年通过读书点燃内心最深的渴望,成为更强大的自己,更美好的自己,也用内心的光明去照亮世界!

例如,巧林是怎么爱上写作的?他经过长时间的偷学、积

累好词好句,有了一定的写作基本功,然后在生活中运用,带着真情实感去表达。他帮亲戚写信,帮生产队的老阿婆跟儿子通信、帮老师给医院写感谢信,每一次都是完成了一个真心托付的命题作文,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很多孩子都喜欢读课外书,但是写作却感到头疼。阅读能力如何自然转化为写作能力?窍门就是带着爱意去生活,运用学到的知识去帮助别人,通过劳动造福他人,你将会获得巨大的乐趣和成就感。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信息和诱惑所包围,很容易迷失方向。然而,《我的村小学校》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渴望和对知识的敬畏。巧林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更是关于一种精神的传承。这种精神跨越了时间的限制,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等环境,只要心中有光,就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我的村小学校》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一场回溯根源的寻根之旅。它让我们直面乡村教育的现状与挑战,深刻认识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每一个乡村孩子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都是亟待点燃的希望火种。关注乡村教育,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呵护民族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巧林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学会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在平凡中发现美好。让我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爱温暖他人,用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历史明星的现代投影与文化消费的特质

杨朝旭



《星河落人间》,何楚涵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

《星河落人间》以独特方式,选取了从先秦到明清的25位文化圣贤,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透过作品,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被精心挑选的历史人物是否真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解读是否暗含某种现代性焦虑?这种文化消费又会对当代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书中出现的文化名人在文化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包括嵇康、李白、杜甫、苏轼、王阳明等。深入分析这份名单背后的逻辑,我们会发现其中隐藏着“大众文化消费”与“学术严谨性”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精选的标准是什么?是历史影响力、文学成就,还是市场吸引力?从作品内容来看,最后一点可能占据了不小比重。

“名人”们不仅因其文化贡献,更因其身上附着的“网红特质”——嵇康的“绝世容颜”,李白的“不食人间烟火”,苏轼的“豪爽但心思细腻”,更容易引发当代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消费欲望。例如,侧重描写嵇康“仙风道骨”的形象,而对《声无哀乐论》的哲学价值却仅用“颠覆性、前沿性”一笔带过。同样,对李煜的解读刻意强调其感情生活中的“渣男”属性,这种处理方式虽增加了可读性和娱乐性,却削弱了历史人物的思想深度。

本书中的25位人物都属于“文化圣贤”范畴,且以文学创作为主,缺乏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代表,这种单一维度的选择无形中强化了“中

国文化等同于文人文化”的狭隘认知。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文化圣贤”的光环下被悄然遮蔽。作者实际上构建的是一条经过高度过滤的文化溪流,这种倾向性在于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情感需求植入历史人物的躯壳中。透过这些历史人物,我们能敏锐地捕捉到整个知识阶层的文化焦虑。

面对司马氏的招揽,嵇康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自己早已对司马昭恨之入骨,而对方居然还想招揽自己”。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任性公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千古名士与现代叛逆青年的形象巧妙对接,强调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冲突——这种充满情绪化的表述,

将复杂的政治伦理简化为善恶对立,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权力与操守之间的身份焦虑。

“心灵救赎”的诉求,则是本书另一维度的投射。何楚涵声称这本书能让人“实现身与心的深度修行”,但实际上,它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在真正的精神成长这一点上颇具争议。

作者在解读孔子时讲:“孔子开发出来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得我们中华文化一直是一个强调和谐、包容,能与时俱进的文化”。这种论述将儒家思想塑造为一种超越时空的完美体系,却恰恰忽略了其在历史长河中与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和被功利化的消极影响,这样一来,可能会从学术的角度掩盖文化发展中断裂、冲突和多元竞争的复杂现实,由此使读者失去了质疑和反思的立足点。

书中隐含的“成功学框架”——即使如李煜这样的亡国之君,也被赋予“艺术成功”的光环。这种对历史人物的“优胜劣汰”选择,暴露了叙事中隐藏的绩效主义逻辑:只有那些在文化领域取得公认成就的人物才值得被讲述。这种叙事模式与当代社会中盛行的成功学叙事如出一辙,反映了市场逻辑对历史文化书写的渗透。作者称李白是“超越痛苦”,而杜甫则是“选择承受”。这种评判的深度对于今人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忽略历史的大环境对人的影响,无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正因为以上种种,反而觉得这本书更值得我们有所舍取地细细品味,至于争议,就让它存在吧。

小柔荐